

異端思潮和 紅衛兵的思想轉向

• 徐友漁

當我於1986-1988年在牛津大學作訪問研究時，發覺到一種有趣的現象：許多牛津大學的教師不停地批判資本主義，表現出一種左傾態度，而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和訪問學者則幾乎和他們完全相反，批判社會主義而讚揚資本主義。這種對比在1987年英國大選時表現得最為鮮明：牛津大多數知識份子對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不以為然，而中國人則偏愛保守黨，對工黨和自由黨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政綱批評或挑剔。當時的中國學生、學者大多為文革時的大學生和中學生，即俗稱的「紅衛兵的一代」，以及受他們影響的更年輕的學生。在當時和返國之後，我和許多人議論過這件事，他們和我深有同感，把以上現象稱為「一代人不可逆轉地向右轉」，並與西方60年代「造反的一代」的反資本主義傾向作對比。我們還一致認為，這一代人思想的轉向並不是「四人幫」垮台後新意識形態的產物(路線、政策有變化，但意識形態無根本變化)，也不能將其歸結為生活於西方而產生的態度變化(大多數未出國的人傾向同樣明顯)。事實上，這一代人思想的劇變是在文革中完成的，而且恰恰是因為文革才有如此巨大(在規模和程度上)的變化。如果說，文革的目的包含培養和造就一代忠於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新人，那麼文革的作用則是適得其反。

「紅衛兵的一代」思想的轉向並不是「四人幫」垮台後新意識形態的產物。事實上，這一代人思想的劇變是在文革中完成的。如果說，文革的目的包含培養和造就一代忠於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新人，那麼文革的作用則是適得其反。

文革給人的表面印象是宣傳機器開動到了極限，紅海洋(街道上每一個可見部分都用紅漆寫上毛澤東的語錄)、早請示、晚匯報(用毛的教誨檢查、批判自己的言行的儀式化活動)等等，思想控制和文化專政無所不用其極，但特別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在這種輿論一律的表面現象後面，是極其活躍的思想探索、交流和交鋒。僅在文革發動之後幾個月，懷疑和批判文革路線的思潮就在最虔誠和激進的紅衛兵中湧現。在此之後，各種自發的非官方思想在中國各地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在各種異端思潮中，具有全國性、長久影響的當推以下作者和文章所代表的觀點：遇羅克的〈出身論〉、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李一哲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這些思潮的出現和廣泛傳播既代表了、

也大大加速了紅衛兵一代和其他人的思想覺醒與轉向。當然，人們思想發生變化還有其他強有力的因素，主要的兩種是：政治和社會現實的刺激與讀書和思想交流活動。

本文將詳細描述紅衛兵一代人在文革中思想轉變的過程，分析以上三種因素的促動作用，特別要討論各種異端思潮產生的背景、包含的內容、產生的影響。本文所謂的「異端」，泛指一切與官方頒布教義不一致的態度、思想、理論。異端既可能表現為對文革的路線和理論(即所謂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疏離與反叛，也可能表現為對它們的自行解釋，這種解釋的動機也許是要更深刻地領會和闡釋毛的晚期思想，但因為其自發性和獨立性仍不能見容於官方。所謂異端，在某種意義上是誇張的說法，因為當時最大膽的思潮也不過是用純正的馬克思主義批判文革中已經走火入魔的官方意識形態，而相當一部分異端思潮不過是要使毛澤東的文革理論更為徹底和自治。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並不能使異端思潮免遭撲滅，歷史表明，越是接近原始教義，對官方意識形態的威脅越大。對思想專制而言，關鍵問題是不要思想，而不在於想的是甚麼，殊途同歸也是不允許的。確實，相當部分的異端思潮在思想史上不會有多大價值，它們的意義在於打開了思想的閘門。當今中國的思想者已經習慣於身穿各式奇裝異服招搖過市，很少有人能夠想像當初掙脫緊身衣時所需要的智慧和勇氣，以及付出的代價。

所謂的「異端」，泛指一切與官方頒布教義不一致的態度、思想、理論，而當時最大膽的思潮也不過是用純正的馬克思主義批判文革中已經走火入魔的官方意識形態。但對思想專制而言，關鍵問題是不要思想，而不在於想的是甚麼。

一 對文革派的批評

發動文革，在馬克思的理論中找不到根據，甚至在60年代之前的毛澤東思想中也找不到直接根據；在運作方式上，中共黨的組織原則也不會給文革提供合法性根據。因此，毛澤東為文革而物色的副統帥林彪搞起了對毛的個人崇拜，如果全黨只有毛說的話才算數，如果「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成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準則，那麼一切都順理成章了。林彪做得很徹底，甚至過火。他在1966年9月18日軍事院校負責人會議上宣稱：「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很多」，「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書太多，讀不完，他們又離我們太遠，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經典著作中，我們要百分之九十九學習毛澤東著作。」北京農業大學附屬中學高中三年級二班學生劉握中和孫立才以「伊林·滌西」為筆名於11月15日寫出〈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批駁了林彪的觀點。他們的立論基於馬列主義純正立場和常識，他們在斯大林論「反對派」的一些論文中找到了思想武器，引證了斯大林盛讚列寧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功績的話，證明不能說毛比馬恩列斯高。他們還指出，毛澤東思想只是馬列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只有對馬列主義的發展有充分認識，才能對毛澤東思想有透徹的理解，因此，99%的比例是不正確的①。「伊林·滌西」的觀點得到不少人的支持，比如北京大學的喬兼武在12月7日貼出大字報，說他們的公開信貼得好，「一好是衝破了一個大框子，二好是更廣泛地實行了大民主，三好是公開信的基本內容、基本精神正確」②。

第二種質疑和批評是針對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北京林學院學生李洪山在11月30日貼出大字報〈踢開中央文革小組緊跟毛主席鬧革命〉，他引證中共中央關於文革的決定即「十六條」說，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產生應像巴黎公社那樣，實行全面選舉，體現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然後指出，中央文革小組的產生就不符合以上精神。而且文革小組的成員不廣泛深入下層，不作全面調查研究，只是到處游說、發議論，他們的講話不管對不對都傳抄翻印，拿到手裏視為珍寶，去指導運動^③。

運動一開始，文革派人物就猛烈抨擊劉少奇、鄧小平、各級黨委領導和工作組，說他們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壓制群眾，他們把民主旗幟搶在自己手裏，裝扮成群眾的支持者，一時大得人心。實際情況當然並非如此，被他們最先利用又最先拋棄的那部分紅衛兵首先看清了這一點，李洪山的大字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說得那麼漂亮，我就要你兌現！

北京大學「虎山行」戰鬥團於12月10日貼出大字報〈毛主席的大民主萬歲！〉和〈第一把火〉，也是重申同樣的原則：你要求別人做到的，你自己就必須做到。大字報引證「十六條」中的話：「人民群眾中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現象。幾種不同意見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眾會在正常的充分的辯論中，肯定正確，改正錯誤，逐步取得一致。」然後說，既然如此，現在許多單位展開對於中央文革小組的辯論，對中央文革小組提出意見，怎麼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呢？難道中央文革小組就批評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頭」？！！^④是首都三司提出了「反對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誰反對中央文革，就砸爛他的狗頭！」北京大學「毛林陳之兵」和「紅老虎」兩個組織的大字報對此加以反駁：「中央文革要我們去保嗎？……無產階級司令部是轟不垮、罵不倒、砸不爛的……；而該倒的，即使我們拼命去保，也是保不住的。」^⑤這正是中央文革鼓動紅衛兵到各省市、各單位去「炮轟、火燒」各級黨委的理由，學生們在這裏遵循的邏輯顯然是：一種理論要徹底，則必須能自返。他們不過是把中央文革的口號應用於中央文革自身。

上述大字報的出現，有派性鬥爭背景，比如「虎山行」戰鬥團，在北大既反聶元梓把持的校文革，也與屬於三司的另一派別「井岡山」對立。大字報的作者往往是一度與中央文革關係密切的保守派，儘管如此，他們在表述自己的觀點時卻採取了一種理性的立場，訴諸當時被認可的意識形態。如果站到純正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堅持中共在文革前更為傳統的理論，那麼可以說林彪的觀點，中央文革的作法，乃至毛澤東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才是異端，而上述反對意見其實是在捍衛正統。這裏就有一個如何裁決正統或異端的標準問題，一方所恃的是經典教義，但另一方擁有權力。文革和歷史上大多數情況一樣，由於掌握權力的人也掌握了對經典的解釋權和發展權，因此是他們給更接近原教旨的人定罪。但是，如果權力在理論上的合法性來自教義，權力的維持要借助於意識形態，那麼教義和意識形態對於統治者就是一柄雙刃劍，因為往往是他們不能恪守教義、口是心非、前後矛盾，這就為反對派留下了話柄和攻擊的餘地。

紅衛兵的發起者和文革派的蜜月期結束後，其言行的異端色彩更鮮明，雖

北京林學院學生李洪山引證「十六條」指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不廣泛深入下層，不作全面調查研究，只是到處游說、發議論。當時學生遵循的邏輯顯然是：你要求別人做到的，你自己就必須做到。他們不過是把中央文革的口號應用於中央文革自身。

然他們更長於行動而拙於理論。「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在其成立宣言中把中央文革的做法稱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在一份通告中，他們提出「忠於馬列主義和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在「聯動」瓦解之後，一些殘餘份子於1967年6月在北京成立了「首都紅衛兵共產主義小組」，並在宣言中直截了當地指稱「文化大革命完全違反了防修反修的初衷，正在演變成迫害共產黨人、迫害工人、貧下中農和革命知識份子的大清洗運動」。

二 遇羅克和〈出身論〉

文革中最早、最具自發性的思潮對立是圍繞着血統論而展開的論戰和鬥爭。血統論最典型的表達是首批紅衛兵在1966年7月底提出並迅速蔓延到全國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血統論思潮以「黨的階級路線」自居，其核心主張有兩點，一是子承父業，二是對非革命家庭背景的人實行赤裸裸的迫害和鎮壓。在〈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一文中有這樣的話：「不依靠工農革幹子弟，還依靠誰？……領導權必須由我們工農革幹子弟牢牢掌握……幾千年來，地主老爺傳宗接代維持統治還不是要依靠家傳嗎？……我們要正告你們：如果你們死不悔改，反動到底，那我們就不客氣了！我們就要像父兄一樣，把刻骨的階級仇恨凝集到刺刀尖上，挑出你們的五臟六腑，那你們就活該倒霉！」

遇羅克寫〈出身論〉，批判的鋒芒首先指向這種帶血腥味的主張，但同時也指向了文革前就實行的在家庭出身問題上的歧視政策。我們可以把《中國青年報》1965年9月9日的社論〈重在表現是黨的階級政策〉視為這種政策最溫和、最理性的表述，它把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當成剝削階級首先物色的繼承人，說「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任務要求我們去團結他們，教育他們，改造他們，使他們逐步脫離剝削階級的影響，跟着黨走革命的道路」。雖然血統論紅衛兵在文革中把這種方針作為「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來攻擊，但它的基礎卻是在政治上把青年先天地分為三六九等。遇羅克沒有採取通常反對血統論的辯論方式，「辯論這幅對聯的過程，就是對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過程。因為這樣辯論的最好結果，也無非他們不算是個混蛋而已」^⑥。他提出：「衡量一個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標準，只有表現才是唯一的標準。」「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力，我們一概不承認。」^⑦在稍後一些的另一篇文章中，遇羅克直截了當地主張，「無論甚麼出身的青年，都應該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⑧。

遇羅克表現出了遠遠超出一般紅衛兵理論家的成熟和徹底，在反對血統論時，大多數人只能援引文革前黨的政策：「一、有成分論，二、不唯成分論，三、重在政治表現。」他指出，關鍵在於，階級成分和家庭出身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如果要計較成分，那只能是對地主、資本家等等本人，而不是他們的子女。當時的青年，要麼已經是勞動者，要麼即將做勞動者，他們不在剝削階級地位中生活，沒有理由把他們趕到敵對階級中去。遇羅克的這一揭露是十分深

紅衛兵的發起者和文革派的蜜月期結束後，其異端色彩更鮮明。「聯動」提出「忠於馬列主義和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並在宣言中指稱「文化大革命正在演變成迫害共產黨人、迫害工人、貧下中農和革命知識份子的大清洗運動」。

刻的，如果說在馬克思主義體系中階級路線有其合法性的話，那麼它也是指根據某個階級（而非某些個人）的經濟地位而使無產階級政黨對之採取不同的策略態度，而從來不指依據家庭出身把人在政治和社會待遇上劃成不同等級，這種並非馬克思主義的作法，在中國暢通無阻實行了十七年，而血統論者還認為它不是革命的，於己不利！

遇羅克的批判相當尖銳和深刻，他指出，「老子英雄兒好漢」出自於封建時代的山大王竇爾敦，父榮子貴的習俗產生於奴隸和封建社會，由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幾乎是超越了資本主義這一社會發展階級，因此，幾千年來維持封建社會生存的血統論又死灰復燃。「由此證明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封建的東西還有廣大市場，還頑固地盤踞在一些人們的頭腦之中。」^⑨他把血統論者的搜身、辱罵、拘留、毆打等等稱為「嚴重侵犯人權行為」，認為用出身壓人的作法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沒有甚麼區別^⑩。

〈出身論〉於1966年10月油印發表，1967年1月18日以「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名義在北京四中部分學生主辦的《中學文革報》上鉛印發表，前後共印9萬份，在北京和全國流傳極廣，影響很大，翻印數估計在百萬以上。圍繞家庭出身問題，遇羅克在《中學文革報》上還發表了〈談純〉、〈填鴻溝〉、〈「聯動」的騷亂說明了甚麼〉、〈鄭兆南烈士的生與死〉等文章。〈出身論〉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據《中學文革報》負責人牟志京回憶，他們收到了除西藏和台灣之外全國各省市來信，表示共鳴，郵件最多時每天有幾個郵袋，以至郵局無法運送。《中學文革報》1967年4月在中央文革壓力下被迫停刊，遇羅克於1968年初被捕，1970年3月5日被處死刑（1979年11月21日平反，宣告無罪）。

遇羅克的〈出身論〉標誌着首次突破文革意識形態框架的獨立思考，它關注的不是文革中支配學生的所謂「政治路線」問題，而是真實的社會問題。遇羅克的思想在當時具有超前性，不但被血統論紅衛兵批判，也被很多造反派學生組織批判。在文革前期，〈出身論〉的異端色彩尤為突出。在傳播自己的思想時，遇羅克表現得很有政治頭腦和鬥爭策略（比如他躲在幕後，與同伴秘密聯絡等），似乎是一個老練的與現行體制對抗的人，但在思想上，他自視為馬列主義忠實信徒，決心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這一點，在他開始撰寫〈出身論〉當天的日記，在編發《中學文革報》的戰友和獄中難友的回憶中，都得到了證實。

三 「四一四思潮」和〈中國向何處去？〉

青年學生和紅衛兵認真地把文革當成一場政治大革命和社會大革命，既然如此，就需要對文革前政權的性質和社會制度作出評價，對這場革命中政權變動和階級關係變動的規模和程度作出闡明。毛澤東的指示和官方的宣傳在這方面語焉不詳、含糊其詞，他們於是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論來自行解釋。

各種被視為「極左思潮」的觀點很快就在各地出現。比如，在1966年10月下旬，北京師範大學屬於「兵團」派的李文博寫出大字報〈公社早已不是原來意義的國家〉，稱中國的領導機構「從形式上與舊社會資產階級專政機器是一樣。這

遇羅克的〈出身論〉於1966年10月油印發表，前後共印9萬份，翻印數估計在百萬以上。據《中學文革報》負責人牟志京回憶，他們收到了除西藏和台灣之外全國各省市來信，表示共鳴，郵件最多時每天有幾個郵袋，以至郵局無法運送。

種機構是官僚主義和奴隸主義的溫牀、社會基礎」^①。陳仲華的大字報題為〈必須改革我國現行「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制度〉，認為國家機構「臃腫龐大，無用累贅」，當權者「不相信群眾，害怕群眾，壓迫剝削群眾」^②。類似的大字報還有〈法西斯黨的危險就在眼前〉、〈大大改善無產階級專政，大大革新社會主義制度〉等等。在遭到本校井岡山公社派的批判後，造反兵團在1967年2月19日的聲明中重申：「就是要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社會主義制度，徹底打掉舊的國家機構，創立起無產階級國家機構的新的組織形式，堅決反對『打倒皇帝做皇帝』。」^③上述觀點被稱為「新思潮」，並受到嚴厲批判。

兩種思潮的對立和鬥爭也存在於中學紅衛兵中，北京的「四三」派紅衛兵中有人寫出了〈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其中宣稱，所謂革命，就是進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而文革就是一輪新的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解決一小撮特權人物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因為現在社會上最主要的矛盾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同特權人物的矛盾」。文章主張，造反派的任務是「促成財產、權力的再分配，促成社會的革命變動，打碎特權階層」^④。

清華大學「四一四東方紅戰團」的理論家周泉纓於1967年8月9日寫就〈四一四思潮必勝〉一文，全面、深刻地闡述了與上面激進觀點相反的見解。作者強調，文革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發動和進行的，也就是說，國家當權的是無產階級。『走資派』在中國的地位和蘇聯完全不一樣。他們在黨內政權機器內未佔統治地位，他們也未形成新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也正因為這樣，十七年來我國的階級陣線基本上是穩定的。經濟基礎基本上是共產主義化的……十七年來掌權的工農兵還是工農兵，十七年來受壓迫的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還是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而知識份子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化得更明顯，但是基本陣線也是不變的。基於這種估計，作者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階級關係儘管有變化，但決不可能來個『大翻過兒』，也決不可能劃分甚麼『老保階級』，『造反階級』」。文章主張，文革中對於國家政權的改變只能是局部的，決不能是徹底的。作者堅決反對這種主張：文革要引起階級關係的大變動，從而導致文革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⑤。

周泉纓由於這篇文章而被逮捕，後來毛澤東指示將其釋放。文章的觀點被北京居主流地位的紅衛兵批判，被說成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思潮，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謬論。

文革中，闡述文革的性質和目的、而又最有影響的文章顯然是楊曦光寫的〈中國向何處去？〉，它被視為湖南省激進的造反派「省無聯」的政治綱領，甚至被說成是所有「極左派」的宣言。楊曦光認為，要搞文革就必須重新評價文革前的十七年，要對「中國社會重新進行階級分析，以重新組織階級隊伍，團結朋友，打倒敵人」。他是怎樣進行分析的呢？他說，十七年來，在中國形成了一個由90%的高級幹部組成的獨特階級，這就是「官僚主義者」階級。「這個『紅色』資本家階級已經完全成為阻礙歷史前進的一個腐朽的階級，他們與廣大人民的關係已經由領導和被領導變成統治和被統治、剝削和被剝削關係，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關係變成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紅色』資本家階級的特權和高薪，是建築在廣大人民群眾受壓抑和剝削的基礎上」。在作者看來，合同工、臨時工、

清華大學「四一四東方紅戰團」的理論家周泉纓於1967年8月9日寫就〈四一四思潮必勝〉一文，作者堅決反對文革要引起階級關係的大變動，從而導致文革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文章的觀點被北京居主流地位的紅衛兵批判，被說成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思潮，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謬論。

下鄉知青和其他地位低下的勞動者是文革的動力，他認為，「引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會矛盾是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個矛盾的發展和尖銳化就決定了社會需要一個較徹底的變動，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實現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會……」。作者最激進的主張表現在公然提出造反派要用槍桿子徹底改造社會，從「紅色資本家」手中奪權，他說：「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且靠武裝奪取政權，靠國內革命戰爭。」^{①⑥}楊因為這篇文章被判十年監禁。

緊接着〈中國向何處去？〉出現的，有署名為「湖南省無聯」的文章〈我們的綱領〉，文中提出了以下觀點：文革的目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砸爛為資產階級特權服務的舊的國家機器。建國十八年來，幹部隊伍中的大多數走進或走過資本主義道路」；不能把奪權僅僅理解為對個人罷官，而應理解為對特權階層的推翻，是砸爛舊的國家機器，武鬥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奪取和鞏固政權的暴力革命^{①⑦}。

1969年初，上海的「中學生串連會」寫出一篇文章〈一切為了九大〉，鼓吹「階級關係變動論」：「從解放戰爭到文化革命，黨內機會主義者與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為主要矛盾，成為革命的主要對象，並因而引起革命陣線內部的依靠、團結、清洗對象的變化。這就構成了階級陣線的大變動。」表現在教育界就是「非黨員要比黨員好，非幹部要比幹部好」。文章主張造反派應該把精力「集中在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砸爛走資派的舊班底上」^{①⑧}。

在當年，紅衛兵追隨毛澤東，很不準確地使用「資產階級」一詞，它成了「剝削」和「壓迫」的代名詞。

類似「四一四」或「省無聯」的思潮，還出現在湖北、廣西、廣東、山東、四川、江西等地。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是，「四一四思潮」和〈中國向何處去？〉哪一個更接近毛澤東的想法，體現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文革中不少人提出了這個問題，並企圖給出回答。答案是不清楚的，支持「四一四思潮」的證據是《紅旗》雜誌於1966年9月第12期社論中說：「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從根本上說來，當權的是無產階級。……這是我國政治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基本的事實，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是鞏固的。」毛澤東在1967年也說過：「『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是錯誤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講部分改善，可以。」但另一方面，1967年《紅旗》第2期社論指出，文革中的奪權鬥爭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第3期社論說，奪權「不是自上而下的撤職和改組，而是由毛主席親自號召和支持的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主張奪權時「不能把它現成地接受過來，不能採取改良主義，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過渡，而是必須把它徹底打碎」。對於中國是否有一個由官僚特權份子組成的剝削階級，毛澤東早在1965年1月29日就在「陳正人同志蹲點報告」的批示中說過：「官僚主義者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二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份子。」

一般而言，毛澤東和文革中的官方輿論對於從「走資派」手中奪權態度決不含糊，但對於那些人的階級屬性、經濟根源、群眾基礎卻避而不談，因為文革

「四一四思潮」和〈中國向何處去？〉哪一個更接近毛澤東的想法，體現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文革中不少人提出了這個問題，並企圖給出回答。但答案都是很不清楚的。

的實質是毛感到「大權旁落」，要奪回來，而並不是一場社會革命。但為了動員和利用群眾，又不得不給奪權運動披上革命的外衣。不少青年學生在思考，「走資派」是「剝削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他們代表誰？一種勉為其難的回答是：他們代表地主、富農、資本家等等，但再過幾十年老剝削份子都死光了，他們的階級基礎又是甚麼呢？文革派人物為了奪權不負責任地胡謔了一些理論，害得愛思考的學生傷透腦筋去補充和發揮，以求理論的完善和邏輯的徹底，不少人因此被宣判為「思想反動」而吃盡苦頭。

四 現實刺激，反思和探索

文革中出現的各種異端思潮使許多紅衛兵對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產生自信，疏離官方宣傳，而中國現實的刺激和他們的親身遭遇，則使整整一代人無法維持原先的信念。政治運動的黑暗與殘忍，上當受騙的感覺，農村驚人的貧窮落後，促使青年學生反思。勤奮的讀書，勇敢的探索，積極的交流，使紅衛兵這一代的思想發生了根本變化。

毛澤東在文革中曾對阿爾巴尼亞的來訪者說，搞文化大革命，是找到了一種形式來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發黨的黑暗面。他可能沒有料到，文革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不僅傷害了他的政敵，還大大地傷害了整個黨的形象和他本人的威信及聲譽。

文革中最使青年學生震驚的是大字報對黨政官員問題的揭發，尤其是對他們的私生活和個人品質的揭露和抨擊。他們以前生活在過份純潔的、禁欲主義的氣氛中，一旦知道那些德高望重的領導一方面號召學生無私無欲，另一方面



文革中最使青年學生震驚的是大字報對黨政官員私生活和個人品質的揭露和抨擊。他們一旦知道那些德高望重的領導一方面號召學生無私無欲，另一方面自己卻花天酒地、腐化墮落、傷風敗俗，便止不住失望和氣憤。

自己卻花天酒地、腐化墮落、傷風敗俗，便止不住失望和氣憤。他們也知道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殘酷無情，各派勢力傾軋和爭權奪利時的歹毒與兇狠，比方失勢的知識份子官員會講到延安整風的悲慘，過去的地下黨員會講起軍隊幹部的專橫，地方幹部會提到中央官員或南下幹部的擅權。他們還從天真的革命熱情中猛省，看到文革並非「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計，而是毫無原則的權力爭奪，把一個幹部定為「走資派」、「叛徒」、「特務」，不是根據事實，而是根據政治需要，甚至出於江青、康生等人的個人好惡，以及喜怒無常的信口胡說。

紅衛兵自己的經歷更證明了政治運動的無原則、無意義、冷酷可怕。儘管許多派別和組織曾經是中央文革的寵兒，但沒有一個派別和組織能夠善始善終。中央文革首先對老紅衛兵翻臉不認人，將他們的「聯動」打成反動組織，繼而把各種造反派組織定為犯了錯誤或捲入「反動逆流」。1967年夏天，紅衛兵們聽到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現在是輪到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猶如當頭挨了一棒，緊接着就以「清查五一六份子」的名義對紅衛兵中的活躍份子搞清算，「對學生不搞秋後算帳」的承諾被證明是一錢不值。最後，通過調動工人和軍隊強行進駐清華大學，毛澤東把紅衛兵統統趕下政治舞台，接着又把他們全都發配農村。兩年多前還被捧為「革命小將」，現在地位一落千丈，心懷不滿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說，政治鬥爭的陰暗面使紅衛兵感到不滿、寒心和有怨氣，那麼通過大串連、上山下鄉等接觸到中國的現實，則使他們對黨在1950、1960年代的失誤有了認識，使「社會主義好」的信念發生動搖。

上海著名紅衛兵頭領安文江於1967年春季走遍中國十多個省，看到的景象使他感到悲憤、失落和幻滅^⑩：

廣州白雲山衣衫襤褸的乞丐向我伸出污黑的手指……陽朔的農田上蹣跚着人拉的木犁；安順飯館內剛揮去嗡嗡叫的蒼蠅又圍上一大群要飯的孩子；川江岸邊古銅色的繃夫拽拉着逆流而上的破帆；廬山腳下一群冷漠的看客圍觀一具倒斃的屍體……懂事後第一次走出大上海，看到如此的貧窮、寒愴、淒苦的圖景，我給震懾了！從小到大，唱的是「社會主義好」；學的是「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心中有一股想吼叫和罵娘的衝動。

更嚴重的是，紅衛兵有時從貧下中農那裏受到的再教育是：解放後不如解放前，共產黨不如國民黨。楊曦光在記述他的一次社會調查的見聞時說^⑪：

湘鄉的一位老貧農向我訴說1959年大躍進中，農民遭受的他們記憶中最痛苦的磨難。他津津樂道地回憶1949年前國民黨時代農民的生活。他特別喜歡國民黨政府試行的貨幣地稅，「一畝一年交一元光洋的稅，然後甚麼也不用交了，」他說。……1959年，由於幹部放衛星（虛報產量），名義上公糧比率上升到收穫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實際上所有收穫交了公糧還不夠。「這都是毛家老爹作孽呀！」他無可奈何地表達他的憤恨……

1967年夏天，紅衛兵們聽到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現在是輪到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緊接着就以「清查五一六份子」的名義對紅衛兵中的活躍份子搞清算，「對學生不搞秋後算帳」的承諾被證明是一錢不值。

在紅衛兵即將退下政治舞台到他們下鄉插隊這一段較長的時間內，出現了大規模的讀書探索和交流的熱潮。他們表現出了忘我的、驚人的學習熱情。農村廣闊的空間提供了走隊串戶、趕集聚會、收聽外台、自由討論的條件，節假日返城探親為他們了解全國各地情況、系統深入地交換思想提供了方便。與文革前嚴格的管理、控制、監督相比，這時學生們讀書的條件要好得多：大批內部讀物流向社會，書籍以驚人的速度交換和流傳，對書籍的討論可以自由不拘地進行。正如安文江在他的回憶中指出的，即使在文革前，學生在學校受到正統的「興無滅資」、革命理想教育，而走出校門就可以讀各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作品，書籍中的人性觀是使人良知未泯的重要因素。大約從1967年夏天之後，官方的意識形態宣傳對紅衛兵不起作用，「封資修」的思想空前泛濫。

與運動前期的狂熱和盲信相比，這時的特點是冷靜和理性，與文革前提倡當「馴服工具」相比，這時以精神獨立為榮，甚至以思想異端為時髦。思想沙龍、文藝沙龍、學習小組、研究會，以及不事聲張、沒有名目的小圈子紛紛成立。僅從那一時期破獲和宣判的「反動集團」之多，即可看出人們思想的活躍，追求真理的決心之頑強。比如，寧夏銀川的十多名紅衛兵在1968年為文革中種種問題困擾，就退出運動，學習理論。1969年，他們從各地、各單位進行聯繫、交流，成立「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創辦油印小報《學刊》，發表〈甚麼是法西斯主義〉等文章。該學習小組於1970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集團」，成員全部被捕，其中三人被處死，一人自殺，一人被虐待致死。

人們閱讀的東西大致有以下四類。第一，本文所論及的各種異端理論印刷品；它們出自同一代人之手，最有啟發性和刺激性；第二，馬克思主義原著，在當時的條件下，它們足以充當批判醜惡的、荒唐的、非人的現實的思想武器；第三，各類外國文藝作品，尤其是新近作為內部材料出版的蘇聯當代小說，它們充滿了人道主義氣息；第四，各類政治、社會、歷史著作，尤其是內部出版的系列著作，即所謂「灰皮書」，其中對這代人產生巨大影響的是南斯拉夫理論家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它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進行了深刻分析，認為共產黨執政後變成了統治工農群眾的新階級。經過閱讀和探索交流活動，相當多的人脫離了原先的思想軌道，其中最優秀者成為1970年代末至今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中堅，有人在政治上繼續研究中國的問題，有人成了新一代文學藝術（尤其是詩歌）的先鋒，還有人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方面進行大膽探討，為日後的改革實踐推波助瀾。比如，不論在中學生、大學生還是文革前下鄉的知青中，都有人研究中國農業發展問題，對人民公社、四清運動、大寨道路、農業機械化以及知識青年問題進行了調查研究，為以後在農村搞承包制作了理論準備。又如，四川東部一群年輕人（包括年齡較長，後來成為著名個體經營者的牟其中）於1972年組織「馬列主義研究會」，寫出了〈中國向何處去？〉、〈勞動價值論質疑〉、〈社會主義由科學向空想的倒退〉等文章，對中國的經濟體制和結構作了認真分析，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體系」的主張，建議「工人實行計件工資，農民實行包產到戶」。

在紅衛兵即將退下政治舞台到他們下鄉插隊這一段較長的時間內，出現了大規模的讀書探索和交流的熱潮。思想沙龍、文藝沙龍、學習小組、研究會，以及不事聲張、沒有名目的小圈子紛紛成立。

1969年，寧夏銀川的十多名紅衛兵成立「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創辦油印小報《學刊》。該學習小組於1970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集團」，成員全部被捕，其中三人被處死，一人自殺，一人被虐待致死。

林彪事件的發生是對文革意識形態最致命的一擊。大多數紅衛兵由此事件認為政治太沒有原則、太可怕了。還有較少的人是以幸災樂禍的心理觀賞文革當局的尷尬處境，可見他們背離正統到何等程度。



五 林彪事件與〈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

林彪事件的發生是對文革意識形態最致命的一擊。林彪是毛澤東唯一的「親密戰友」，是黨章國法載明的副統帥和接班人，是在「公安六條」中唯一與毛澤東並列的人，誰批評和攻擊他誰就是「現行反革命」，現在，他被宣布為「叛黨叛國，自取滅亡」，他和其他六個文革中權傾一時、紅得發紫的政治局委員被指控為組成了反黨集團，這不啻是對文革的最大諷刺，對人們政治信念最無情的嘲弄。我在訪談中得知，大多數紅衛兵由此事件認為政治太沒有原則、太可怕了，他們認為，這種事都可以發生，今後除了相信自己，甚麼人都不能相信了。還有較少的人，他們或是認為林彪事件並不出人意料，或是以幸災樂禍的心理觀賞文革當局的尷尬處境，可見他們背離正統到何等程度。

林彪事件是一場政治和權力危機，這方面的問題得到了解決，但它激化的意識形態危機卻未能解決，林彪是毛親自挑選和樹立起來的，而毛被說成是「明察秋毫」，為了維護毛的威信，當局公布了據說是毛在1966年7月給江青的信，以證明毛對林彪早有覺察。但問題在於，如果早已知道林彪不是好人，為甚麼還要重用他呢？因為林彪等人曾有相當功績和威信，為了揭露和搞臭他們，公布了他們反對毛澤東甚至圖謀刺殺毛澤東的情況，但人們卻由此看到了上層權力鬥爭的殘忍、無所不用其極。此外，說林彪的反黨綱領是「主張設國家主席」，也顯得費解和滑稽。最嚴重的是，為了證明林彪集團的反動，公布了他們

的「571工程紀要」，其中攻擊文革派「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說「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等等，與其說其作用是批判和揭露，還不如說引起了共鳴。

對林彪事件作出的最深刻、具有歷史意義的反應是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此文在批判「林彪體系」的名目下，尖銳地抨擊了文革的現實，由於林彪集團的所作所為並不僅限於文革，因此此文的意義也超越了文革時期，尤其是明確提出民主和法制問題，觸到了過去、當時及以後中國問題的要害。

大字報勇敢地譴責了文革的現實，諸如「獎懶罰勤的突出(空頭)政治，念經式的『天天讀』，越搞越虛偽的『講用』，越鬧越荒謬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鼓勵政治投機的『表忠』，不倫不類的『忠字舞』，不勝煩瑣的忠孝禮儀——早祈禱、晚贖罪、集會、集隊、上下交換班、買賣東西、寫信、打電話、甚至吃飯等等，都塗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氣氛。」還有「損害工農群眾基本利益的『公產風』，『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黨風，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立竿見影』的學風，提倡講假話的『新八股文風』，『小節無害』論所鼓勵的腐敗惡棍作風，以及『當今走後門成風』，以及「那些公式化的階級鬥爭『說教』、『渣滓洞』式的牛欄，比之歷史上的『三·一八』……等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屠殺——僅廣東一省被殺害的革命群眾、幹部就近四萬人，被關、管、鬥的革命幹部、群眾上百萬人」。大字報強調，問題的關鍵是毫無法制，「林彪一夥多年來無法無天，橫行殺人，搶男霸女」，「到處在抓人，到處在鎮壓，到處是冤獄」。

大字報把林彪集團體現的文革路線的實質歸結為封建和法西斯，它指出，林彪集團「要搞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政」。他們的理論「是把我黨我軍搞成『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關係的社會法西斯論」。林彪的封建性表現於他的「新禮教原則——誰反對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誰」。林彪集團之所以能得勢，其體系能風靡一時，原因在於「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深入於群眾乃至於一般共產黨員的頭腦之中」，文章的作者宣稱，他們認為主要危險是封建的社會法西斯專制，反封建是中國人民的重要任務。以上論點，在「四人幫」垮台後為進步的理論界人士所繼承和發揮。

作者主張，文化大革命的首要任務不是別的，只是要鍛煉群眾的民主精神，讓群眾掌握民主這個武器。在人民的權利中，最根本的是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因此，寫上憲法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都應該兌現。

大字報是寫給毛澤東和四屆人大的，它代表人民群眾提出以下希望：一、要法制，不要禮制，廢除「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打倒誰」的原則，允許光明正大的反對派；二、限制特權，對走後門成風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三、保證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使他們可以隨時撤換失去信任的幹部；四、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制定條例制裁那些知法犯法、製造假案、私立專案、大興肉刑的官員；五、落實政策；六、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

對林彪事件作出的最深刻、具有歷史意義的反應是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此文在批判「林彪體系」的名目下，尖銳地抨擊了文革的現實，明確提出民主和法制問題，把林彪集團體現的文革路線的實質歸結為封建和法西斯。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被當作反面教材大量印刷散發，作者被關押之前遭批鬥一百多場(可以答辯)，因此其觀點流傳極廣。我在採訪中從一個曾在河南一支空軍地勤部隊工作過的前紅衛兵處得知，那裏不止一批人從不同渠道得到並討論和傳抄這份大字報。

六 簡短的結論

限於篇幅，僅以以下幾點結論結束本文。

一、本文討論的異端思潮不能視為造反派的綱領，它們都遭到各造反派組織的批判；

二、異端思想的提出者目的是要闡述和捍衛純正的馬克思主義，甚至毛澤東思想；

三、異端思想一冒頭就遭到迅速撲滅，提出者遭到的鎮壓遠較文革中其他人(比如打砸搶份子)為甚；

四、返回馬克思的原初教義，是文革中幾乎一切思想者背離文革正統的必經階段；

五、一代人思想的轉向是在本土完成的；

六、文革結束後，思想轉向過程仍在繼續和深化，並擴大於更年輕的人。

註釋

①③ 北京大學《文革通訊》編輯部：《文化革命通訊》，1967年第1期，頁17-19；22。

②④⑤ 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辦公室編：《大字報選·增刊》，第14期(二)，頁33；37-39；40-44。

⑥⑦⑩ 遇羅克：〈出身論〉，《民主中華》(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9)，頁18；22、23；29、27。

⑧⑨ 遇羅克：〈談鴻溝〉，《中華論壇》報(北京)，1967年2月27日，第4版；第2版。

⑪⑫⑬ 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辦《井岡山》報，1968年3月27日、4月10日。

⑭ 摘自油印傳單，注明轉自《「四三戰報」湘江評論》，1967年6月15日。

⑮ 引自清華大學《井岡山》報，1967年8月26日。

⑯ 引自《民主中華》(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9)，頁31-50。

⑰ 引自「湖南省無聯」傳單。

⑱ 《紅衛戰報》，第48期，1968年1月20日。

⑲ 安文江：〈我不懺悔〉，載《歷史在這裏沉思》，第5集(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頁317-18。

⑳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9。

徐友漁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關於文革的論著有：〈評《劍橋中國史》第15卷關於文革的描述和觀點〉、〈西方學者對中國文革的研究〉、〈再說文革中的造反派〉、〈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行為動因的調查和分析〉等。